

湖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十一五”规划资助课题

湖北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 政策与体制研究

HUBEI XINSHENGDAI NONGMINGONG SHIMINHUA DE
ZHENGCE YU TIZHI YANJIU

许林 著



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ZHONGGUO DIZHI DAXUE CHUBANSHE YOUXIAN ZEREN GONGSI

湖北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

HUBEI XINSHENGDAI NONGMINGONG SHIMINHUA DE

政策与体制研究

ZHENGCE YU TIZHIYANJIU

许 林 著



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ZHONGGUO DIZHI DAXUE CHUBANSHE YOUXIAN ZEREN GONGSI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湖北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政策与体制研究/许林著. —武汉: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2011. 6

ISBN 978-7-5625-2599-8

I. ①湖…

II. ①许…

III. ①民工-城市化-研究-中国②民工-社会政策-研究-中国

IV. ①F299.21②D66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82646 号

湖北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政策与体制研究

许 林 著

选题策划:郭金楠 田学超

责任编辑:王文生

责任校对:张咏梅

出版发行: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邮政编码:430074

(武汉市洪山区鲁磨路 388 号)

电话:(027)67883511

传真:67883580

E-mail: cbb@cug.edu.cn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http://www.cugp.cug.edu.cn>

开本:787mm×960mm 1/16

字数:350 千字 印张:16.5

版次:2011 年 6 月第 1 版

印次:201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刷:武汉路南印务有限公司

印数:1—600 册

ISBN 978-7-5625-2599-8

定价:35.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前 言

以农民工市民化为内核的城市化进程,是现代社会结构变化不可逆转的大趋势。所谓农民工市民化,指的是在我国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借助于工业化的推动,让世代生活在农村的广大农民,离开土地和农业生产活动,进入城市从事非农产业,其身份、地位、价值观念及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向城市市民转化的经济社会过程。这一转化是传统农民脱胎换骨走向现代文明的过程,是推进社会历史进步的过程,也是实现我国现代化不可逾越的阶段。积极顺应这一转化规律,加快农民工市民化,不仅是现代社会结构变迁的必然趋势,而且对整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将产生不可估量的深远影响。

“二战”结束后的1946年,作为法国第一产业的农业占据国民经济的主导地位,占GDP的比例为36%,而服务行业的第三产业则为32.5%;但是到了1975年,农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下降到了10%,而第三产业则上升到了50.8%。这一变化与大量农业人口向其他产业的转移是密不可分的。尽管20世纪60年代的法国仍处于战后重建的进程之中,但是农业劳动者的下降趋势似乎不可避免,这也是当时整个欧洲工业化和城市化这一不可违逆的历史潮流。1967年,法国著名社会学家亨利·孟德拉斯出版了《农民的终结》一书,在书中,他预言甚至是断言了法国的小农作为一个阶级的消亡趋势。当时的法国,作为欧洲最大的农业国,面临着农民数量的急剧减少,农业从业人口大幅向第三产业转移的状况。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东方的中国,在对现代化的孜孜追求之中,城市开放与农村改革齐头并进。80年代以来,农业虽然仍扮演着国民经济主要成分的角色,但是由于人多地少的矛盾等推力因素和社会开放程度的不断扩展等拉力因素的作用,农村人口大量向城市转移,农业就业人口不断减少。最初是“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就地转移,

即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就地转移农业剩余劳动力;后来则是“离土又离乡,进厂又进城”,农民自发地大规模进城务工经商。2003年,国家统计局农调总队对全国31个省市的6.8万个农村住户和7100个行政村进行的抽样调查显示,我国有1.139亿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占农村劳动力的23.2%。其中,6910万农村劳动力到地级以上大中城市务工,占外出务工农村劳动力的61%;5620万农村劳动力跨省流动,占外出务工农村劳动力的49.9%。2004年,尽管国家的农业扶持政策使得一部分外出务工的农民回乡从事农业生产,尽管多种因素的作用导致了部分沿海城市出现所谓的“民工荒”,但是,作为一个整体的农民工数量仍是十分庞大的。农业部数据统计结果显示,2004年全国外出就业的农村劳动力约1.03亿,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21%。2009年5月,劳动保障部的快速调查统计显示,目前在城镇的农民工总数约为8907万人。这一数字显然比实际规模要小,根据过去进行的抽样调查结果,外出务工的农村劳动力中除了进入城镇从事非农职业外,大约有20%进入农村从事非农产业。按照这样一个比例,加上补足5%的漏报比例,可以推算进城农民工约为1亿,跨省流动就业的农民工约为6000万。2009年3月,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08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显示,全国人口中,流动人口为14735万人,其中,跨省流动人口4779万人,这其中绝大部分是农民。大规模农民工进城的同时,我国城市化的进程也在不断加快,有学者惊呼中国正在经历“村落的终结”,1985年到2008年,中国的村落个数由于城镇化和村庄兼并等原因,从940617个锐减到709257个,仅仅2008年一年就有25458个村落消失。

“二战”后的欧洲在美国“马歇尔计划”的援助下开始恢复重建,到1960年欧洲的重建基本完成,之后就逐步地步入繁荣发展时期(1900—1974),而法国的经济结构调整正是在这一时期进行的。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同样也面临着经济结构调整的问题,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以来,产业结构的调整力度不断加大。两个不同时期、不同地域、不同文化但却同样历史悠久的国家,在迈向现代化的轨道中,都出现了农民数量减少、农村劳动力向其他产业转移、农村人口转变为城市人口的现象。这种基于不同背景上的共同之处绝非偶然,宏观观之,可以说是社会变迁的必然趋势。然而,在社会转型加速期的中国这样一个复杂的社会里,这样一种笼统的说法,怎能将社会变迁带给农民的酸甜苦辣

描绘清楚呢？又怎能将发生在农民身上的诸多变化阐释清楚呢？

时下的中国，农业、农村、农民这一“三农问题”不仅是党和政府高度重视的问题，也是整个社会极其关注的话题，同时也是学界的热点课题——“三农问题”被放在了史无前例的高度。“三农”问题到了一个非常紧迫的地步，非解决不可了，否则可能就会导致社会的不稳定。如果进行逆向思维，应该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哪怕是在当前的清明盛世中，农民以及与农民相关的农业、农村问题的解决也绝非易事。因此，这需要我们对农民问题进行长期的关注和研究。

不过，农民问题纷繁复杂、头绪万千，研究者有必要选取一个可能的角度和领域。20世纪80年代以来，出现在中国广袤的农村地区的一个最为声势浩大的现象——农民工进城已经被众多的学者所关注和研究，也产生了大量的学术成果。或许有人认为，农民工进城问题的研究已经“透了”，或者说没有研究的前景了，不可能产生有意义的学术成果了。但是，依笔者愚见，只要农民工进城的现象一日不终，对农民工进城问题的研究就不应终结，只要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没有完成，就不应忽视对农民工进城逐步实现城市化、获得现代性这一看似平常而实则意义重大的现象的研究。

作者

2011年6月

目 录

第一章 导论	(1)
第一节 选题背景及意义	(1)
第二节 已有的研究	(2)
一、一般理论研究	(2)
二、具体经验研究	(4)
三、简要评述	(14)
第三节 研究方法	(15)
一、资料收集方法	(15)
二、分析方法	(17)
第四节 相关概念界定	(19)
一、农民进城	(19)
二、农民工	(19)
三、进城农民工	(20)
第二章 我国农民工进城的历史阶段	(21)
第一节 大量涌入期	(21)
一、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存在提供了基础动因	(22)
二、城乡差别的存在提供了深层推力	(22)
三、城市就业机会的存在提供了现实可能	(22)
四、约束机制的缺乏提供了制度缺口	(23)
五、自然灾害的频繁出现提供了客观原因	(23)
第二节 严格限制期	(24)
第三节 逐步松动期	(26)
第四节 调控服务期	(29)

第三章 当代我国农民工进城的现实原因	(34)
第一节 有关农民工进城原因的理论	(34)
一、拉文斯坦的人口迁移法则	(34)
二、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	(35)
三、博格的推拉理论	(35)
四、托达罗的城乡劳动力转移模型	(35)
五、斯塔克的相对贫困假说	(36)
六、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理论	(36)
七、理性选择理论	(37)
第二节 农民工进城的宏观原因:推力与拉力并存	(37)
一、农村推力因素	(38)
二、城市拉力因素	(41)
第三节 农民工进城的微观机理:理性与感性之间	(46)
一、农民工进城中的理性与感性	(46)
二、农民工进城中感性选择的具体表现	(48)
第四章 进城农民工的生存状况	(52)
第一节 进城农民工的职业境遇	(52)
第二节 进城农民工的生活状况	(62)
一、进城农民工的物质生活	(62)
二、进城农民工的精神生活	(71)
第三节 进城农民工的社会地位	(76)
一、进城农民工的称谓属性	(76)
二、进城农民工的经济地位	(77)
三、进城农民工的政治地位	(78)
四、进城农民工的地位认同	(81)
五、进城农民工的地位分化	(85)
第四节 进城农民工的社会网络	(88)
一、找工作过程中的关系网络	(88)
二、城市生活中的关系网络	(91)
第五节 进城农民工的城市适应	(94)
第六节 进城农民工与市民的冲突	(100)
第五章 农民工进城的后果分析	(103)
第一节 农民工进城对个人的影响	(103)

一、人力资本积累	(104)
二、社会资本增加	(109)
三、观念行为变迁	(113)
第二节 农民工进城对社会的影响	(125)
一、对流出地社会的影响	(125)
二、对流入地社会的影响	(144)
第六章 进城农民工管理研究的基础理论	(154)
第一节 关于人性的讨论	(154)
一、不同视角的人性认识	(154)
二、人性研究的几个基本观点	(155)
第二节 关于需要理论的研究	(156)
一、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的享受需要和发展需要研究	(157)
二、亚当·斯密关于需要的理论研究	(157)
三、马林诺夫斯基的“需要三层次”理论	(158)
四、马斯洛的“需要五层次”理论	(158)
五、我国学者薛克诚等人对需要多样性的研究	(159)
六、关于“需要限度理论”研究	(159)
第三节 关于进城农民工行为适应、行为失范的理论分析	(162)
第四节 关于进城农民工管理的复杂性认识	(166)
一、内享复杂性	(166)
二、主观(认识)复杂性	(168)
第五节 研究的基本理论依据	(169)
第七章 进城农民工的社会支持系统	(172)
第一节 进城农民工社会支持系统的现实意义	(172)
一、社会公正的需要	(172)
二、社会和谐的需要	(174)
三、社会发展的需要	(178)
第二节 进城农民工社会支持系统的基本模式	(180)
一、价值系统	(181)
二、制度系统	(183)
三、组织系统	(186)
四、个体网络系统	(189)

第八章 农民工市民化的主要障碍分析	(191)
第一节 思想观念的障碍	(191)
一、城市管理者的忧虑	(191)
二、市民的偏见	(192)
第二节 制度障碍	(192)
一、户籍制度使得农民工不能享受应有的国民待遇	(192)
二、农民工社会保障权的缺失	(193)
三、土地家庭承包制牵制了农民工的流动	(194)
第三节 政策障碍	(195)
一、二元劳动力市场的限制	(195)
二、农民工子女教育的不平等	(196)
三、农民工住房政策的缺乏	(197)
第四节 社会组织障碍	(198)
一、城市组织的排斥和缺位	(198)
二、农民工自组织的混乱	(198)
第五节 农民工自身的素质障碍	(199)
第六节 城市化水平的障碍	(200)
第九章 农民工市民化的实现途径分析	(202)
第一节 优化农民工市民化的软环境	(202)
一、统一思想认识,优化舆论环境	(202)
二、加快法制建设,创造良好的法制环境	(202)
第二节 改革与完善相关的制度	(203)
一、深化二元户籍制度的改革,落实农民工的国民待遇	(203)
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将农民工纳入保障范围	(204)
三、建立适宜的土地流转制度,促进农民工的有效流动	(205)
第三节 建立健全政府相关的政策保障	(206)
一、落实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	(206)
二、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机制	(207)
三、改善农民工的住房条件	(208)
第四节 充分发挥城市社会组织的作用	(208)
第五节 加强对农民工的教育培训	(209)
一、提高农民工的科学文化水平	(209)
二、重视农民工思想道德的教育	(209)

三、加大农民工职业技能的培训	(210)
第六节 推进城市化的进程	(210)
一、建设具有区域性功能的城市群	(210)
二、充分发挥城市第三产业的后发动力作用	(211)
第十章 结 论	(212)
第一节 研究的基本成果	(212)
第二节 主要创新点	(213)
第三节 几点基本认识	(213)
第四节 本研究的主要不足和研究展望	(214)
附 录	(215)
附录 1 建国以来关于农民工进城的主要文件	(215)
附录 2 农民工基本情况调查问卷	(225)
附录 3 市民调查问卷	(233)
附录 4 进城农民工需要满足情况测量表 1	(235)
附录 5 进城农民工需要满足情况测量表 2	(241)
参考文献	(245)
后 记	(252)

第一章 导论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当中国社会进入快速社会转型时期,出现在中国广袤的农村地区的一个最为声势浩大的现象就是农民工进城——农村人口大量向城镇转移,农业就业人口不断减少。最初是“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就地向乡镇转移,后来则是“离土又离乡,进厂又进城”的自发性大规模进城务工经商。这一宏大的社会历史事件背后隐藏着怎样的结构性原因,这些进城的农民工在城市中是如何生活的,进城后他们自身的人格结构发生了怎样的转变,又该如何帮助他们实现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这些问题引导我们对农民工进城这一现象的历史、现状和未来进行全景式的探讨。

第一节 选题背景及意义

从经济社会发展的普遍性现象看,任何一个国家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必然经历一个产业结构和城乡结构的转换过程,以及与此相联系,也经历着由农业人口向非农业人口、农村人口向城乡人口转换的过程。整个过程也就是工业化、城市化、社会化的过程。而在这一过程中,由于二元经济结构的影响,在农民由农村向城市转移的过程中,出现了一批特殊群体——农民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两亿农民工已成为我国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我国城市化和工业化的主导力量。农民工群体在我国工业化、城市化、社会化的过程中,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促进了我国的整个现代化进程。在此过程中,我国的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取得了显著成绩。但同工业化的发展速度相比,城市化速度仍严重滞后。当前,中国的城市化率与同等发展水平国家相比要低约 10 个百分点,与同等工业化水平国家相比要低约 20 个百分点。我国的城市化水平已成为严重制约我国现代化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

农民工进城,一方面为城市作出了极大贡献,促进了城市经济的发展,农民工为城市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资源,并创造了极大的物质财富;农民工促进了所在城市产业结构的调整,使之向着现代产业结构的方向发展。但另一方面,农民

工进城也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如城市交通的拥堵、治安的混乱以及城市环境的破坏等。之所以产生以上问题,是由于农民工的权益没有得到很好的维护:农民工从事着城市里脏、乱、差的职业;居住条件和生活状况极其恶劣;在思想观念上,得不到城市人的认同;在就业以及社会保障等各方面受到严重歧视。因此,农民工成为城市里的弱势群体。再加上农村经济发展的局限,他们又不可能回到农村生活,使得农民工成了社会上的“边缘群体”。农民工的各种权益得不到维护,城市中的相关问题得不到解决,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我国城市化的发展。

农民工市民化是我国加速城市化的重要内容,是解决农民工问题的最终出路,是社会变迁的时代要求。农民工市民化也是社会经济发展的迫切需要,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一方面,通过农民工市民化,可以减少农民的数量,增加城镇人口,促进农村和城市结构的调整,从而加快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另一方面,通过推进城市化进程,让已经具备条件的农民工逐步转化为市民,以保障农民工的生存与发展,减少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总之,通过农民工市民化,对于农村经济的发展、加速城市化进程、促进城乡一体化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第二节 已有的研究

当前,关于农民工进城的研究很多,这是我国目前的现实社会变迁和社会流动状况的一个侧面反映,正是因为越来越多的农民涌入城市从事非农职业,形成所谓的“民工潮”,才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20世纪80年代以来,来自不同学科领域的研究者从不同的范式、视角和框架出发,研究了农民工进城这一宏大历史事件中的一般性和特殊性,形成了相当多的研究成果。下面,笔者将这些研究分为一般理论研究和具体经验研究两个方面来进行审视。

一、一般理论研究

1. 研究范式

关于农民工进城研究的基本范式,有研究者指出,国际社会学界对人口迁移的研究大致经历了三种范式。

一是古典和新古典主义下的“均衡”范式。人口流动被视作是由于资源分布不均衡而引起的(典型的如“推—拉”说),而其结果则是使经济要素在各地域间形成新的平衡。移民在迁入社会的适应过程,也被假设为一个随着时间推移彼此不断同化的过程。

二是结构—历史—功能主义的范式。认为人口流动不全是物质资源分布不均衡的反应,而与一系列的传统、结构和历史因素有关。比如人们用“世界体系”理论来解释国际移民,用“国内殖民主义”来解释国内移民。在此范式下,人口的流动被视为是对特定结构的回应,其结果是满足结构的某种需求,带有功能主义的色彩。

三是随着吉登斯、布迪厄等人的社会学理论兴起而提出的,可称之为“主体—实践”范式。它强调移民是一个能动的社会主体和政治主体,每时每刻都在以自己的“实践”来创造新的东西,而不是完全为“结构”所规定的行动者。黄平等人的研究提出,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综合了与社会学一向对立的整体论和个体论的视角,并以此尝试对农民的非农转移做出新的理论说明。他们认为,就结构和主体的关系而言,如果没有结构性因素和条件提供的可能和制约,农民不可能实施外出,反之,如果没有农民外出的需求,无论什么样的制度安排也是没有意义的;就农民的行为而言,农民在外出和转移过程中总是不断反思自己的行动,改变自己的目标。因此,这些行动的后果,常常是未曾预料的,更不一定是“合乎理性的”。

2. 理论视角

有学者指出,近年来有关农民工进城这一现象的研究,以两种分析框架为主。一是将社会流动放在社会结构中来探讨,首先设定社会是以分层或地位的方式构成的,然后再将流动的概念放入其间来考察各种社会成员因某些因素的影响而在其中形成的流动驱力、规模、方式、功能或由此而生的社会问题等。二是运用社会关系网络理论,将个体的流动过程看成是其通过建立社会网络来实现的。后者与前者最大不同就在于,后者不强调个人在社会结构中所处的位置属性,比如性别、年龄、身份、阶层等,而是强调个体在其社会关系网络中所处的相对优越位置,以及他所能获得的促使其流动的资源所在。还有学者综合了国内学者对这一课题的研究,明确指出这些研究所采用的五种主要的理论视角:

(1)社会分层与流动的视角。这种视角认为农民工群体的产生是社会结构变迁和社会分化的结果,他们的地位虽高于仍在农村务农的农民,但在城镇等级分层体系中仍处于最下层,他们的流动不仅是通常意义上的劳动力流动,更是一种社会流动,它包含着社会地位的变化。

(2)冲突与失范的视角。在城市居民和官员的眼中,流动农民是外来者、无根的非市民、流浪者,像漫无目的、漂泊不定、不祥的洪水一样,持续地、不合适地、无控制地涌进城市,成为中国城市中的“另类”,他们极可能在城市中造成冲突与失范。

(3)人的现代化与农村现代化的视角。这一视角的研究者注意到农民工进

城这一历史事件对农民个人和其流出地农村社会的影响。一些学者认为农民工进城是一个获得现代化的过程或二次社会化的过程,还有一些学者认为农民工进城对于提高农民经济收入、促进农村经济发展、推动农村社会现代化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

(4) 社会网络的视角。前述三种研究视角可以说都是地位结构观,社会网络视角则是一种网络地位观,此种视角将流动农民看作是关系网络中的一个结点,他们通过该网络来求职和生活。

(5) 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的视角。这种视角认为改革前重国家、轻社会的模式已经改变,大规模农民流动出现的一个原因就是国家从乡村社会生活中的部分退缩。研究者主要考察的是利益集团或精英人物的作用,而这些精英分子以经济精英为主。

二、具体经验研究

社会学认为,农民流动进城不仅仅是劳动力的流动、人口的流动,同时也是一种社会流动,包含了地域流动、职业流动和阶层流动三个方面。就社会学的研究领域来看,大多数国内学者更倾向于实证的、经验的研究,这显然与农民工进城这一社会事实的基本属性有关。综合看来,学者们关注的是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1. 进城农民工群体的流动行为

自 20 世纪 80 年代末以来的农民工进城运动,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最大规模的自发性社会流动,其背后的动因是什么?他们是以何种方式进入城市的?又怎样通过网络在城市进行谋职和生活的?这些是有关进城农民工群体流动行为中最受关注的几个方面。流动动因是进城农民工群体流动行为研究中的首要问题,它能揭示出在制度壁垒依然强大的环境下农民仍要进城的原因,这也是早期学者们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大多数学者借助西方学者在研究人口迁移和流动时的理论来解释我国农民工进城现象,其中特别是以借鉴“推拉理论”为主,以此来说明农民工进城的宏观原因。根据“推拉理论”,中国当前的二元经济社会结构,特别是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现实状况,导致了欠发达地区的农村人口流向发达地区和城市。学者们对农民工进城过程中的推力、拉力因素进行了具体分析,一些学者还对“推力”、“拉力”因素在实际中发挥的作用进行了检验。

除了从宏观层面解释农民工进城外,一些学者还从微观层面研究了我国农村劳动力外出的原因,认为中国农民是否外出,是家庭整体决策而非个人行为的结果,其首要目的是增加收入,并且将外出看作是一种人力资本的投资,这种投资的预期与人力资本的状况如年龄、性别、教育状况等是相关的。学者们还针对

“盲目外出”的说法,从不同角度提出了“理性”的概念,如经济理性、迁移理性等,其共同点是认为外出是利益最大化的选择。还有学者提出“生存理性”概念,认为农民为寻求生存而非在市场下追求利润最大化,是中国农民在现实面前作出种种选择的首要策略和动力。还有学者则从社会学的理性选择理论出发,提出了“社会理性”的概念,把人的理性行为分为三个层次,即生存理性、经济理性和社会理性,认为在农民外出就业发生初期,其往往更多表现的是生存理性选择,但随着外出寻求就业次数的增多和时间的拉长,社会理性选择和经济理性选择将表现得越来越突出。

流动方式是国内学者在研究农民工进城行为时的又一重要关注点。经典的人口迁移理论认为,人口迁移是由独立的个人为达到预期收入最大化而进行的,但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迁移经济学认为,人口迁移的决定并不是由独立的个人做出的,而是由相关的更大单位特别是家族或家庭来共同做出的。这里,人们的行动可以被称为“集体化”的行为,它不仅可以使个人的预期收入最大化,而且也可以使家庭风险最小化并尽量脱离与本地各种市场相关联的条件的约束。我国农民工进城的方式基本上也是这样的,农民工进城主要是为了获取较高的经济收入——这一点是不可质疑的,其决策受到家庭的影响,并且表现出家庭化的流动趋势。但是有研究者指出,家庭是否能够简单化为一个“整体”,所有的决策都是“天然”地从家庭整体利益最大化出发?谭深的调查表明,如果将外出动机的指向分作“为家庭”和“为自己”两项,相当大比例的外出者主要从自身的需要出发而不是从家庭的需要出发外出打工的。

随着社会网络研究的兴起,国内学者也开始将网络理论应用于农民工进城的研究,因而流动网络也是近年来学者们研究农民工进城行为的一个侧重面。调查显示,农民工进城所依靠的社会资源最主要的不是来自政府和市场,而是社会网络,在农民工生活和交往的整个过程中,这种社会网络都起着重要的作用。一些学者研究指出,农民工进城后,尽管所面临的环境不同,职业及生活方式也发生了变化,但这些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他们对以血缘、地缘等关系为纽带的社会网络的依赖。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原因在于在缺乏社会公开信息供给和组织服务的情况下,或者说市场与组织的低效或无效的情况下,社会网络的存在无疑降低了他们的流动风险和成本。或者说,社会网络作为一种与“现代性”原则格格不入的传统社会关系,成为权力、市场之外的一种资源配置方式。但在随后的再次职业社会流动过程中,原有社会网络成员所发挥的作用就发生了变化,流动农民不得不寻求新的关系网络、就业市场信息等途径。进城农民工的社会网络中主要是由强关系构成,其社会支持也基本上是来自强关系,但与此同时,农民工流动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重新构建新的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网的过程。

程,农民工在城市也经历了学习和再社会化过程,其中一部分扩展了弱关系,并利用弱关系来为自身谋取利益。但是,从总体上来看,进城农民工的社会网络规模是不大的,流动农民的社会网络特征表现为规模小、紧密度高、趋同性强、异质性低,社会支持关系和社会讨论关系都很少,不过相比而言农民工社会支持网的二方关系、三方关系及整体网络特征指标均明显高于社会讨论网络。

2. 进城农民工群体的生存状态

农民工进城后,原先“看起来很美”的城市社会并非他们想象中的那样美好,他们生活在城市的边缘,与城市社会那么近而又那么远,并没有真正适应和融入城市。“边缘人”可以说是对当今中国农民工基本生存状态的总体概括,大多数学者认为城市农民工实际上处于一种边缘化的生存状态。这方面的研究成果颇多,如在边缘化的表现方面,学者们指出进城农民工在居住、职业、收入、子女教育、家庭生活、医疗卫生、闲暇活动、社会关系、政治参与、权益保障等多方面都体现出边缘化特征,而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制度、文化和心理方面。进城农民工就像“劳工候鸟”一样,不断地往返于城市和农村之间;他们是一种“边缘人”,生活在城市空间的边缘、体制意义上的边缘以及文化意义上的边缘。这种边缘化的生存状况对于进城农民工自身来说是十分艰难的,同时也会造成一系列的社会问题。有学者指出作为边缘人的农民虽然不是边缘性人格障碍症患者,但是其心理特征有些类似,因而他们的行为表现为或逃避或对抗——逃避现代都市文明、逃避艰苦的农村生活、逃避都市责任、逃避农村义务。因此,需要关注“边缘人”的生存状况,淡化边缘色彩。

以何种方式将农民工聚集在一起的呢?这里就涉及到进城农民工的组织化问题,主要包括外来人口社区研究以及进城农民工组织特征方面的研究。农民进入城市后,往往聚居于城市的边缘地带,形成所谓的“城中村”。如早在1995年,就有学者从社会结构和社会重建的角度对北京市一个温州人聚集的“浙江村”做了全面深入的剖析,由此拉开了这类研究的大幕。此后还有不少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研究了京城的这个“浙江村”,认为从事经营的温州农民以“产业—社区型”进入城市,是一种独特的进入方式,它对应着城市商业管理体制和城市居民消费结构变化的市场机会结构;它不仅是一个聚居地,而且促成了一种新的产业组织形式产生,这种组织以“内部市场”方式分工协作,以区别于大厂商组织和外部市场,它对传统资源——主要是乡土资源的利用是十分明显的,并且还与管理体制形成了特殊的关系。有学者认为城市外来人口已形成了一个“新的社会空间”,具有不同于其他社会群体的生存方式、行为规则、关系网络乃至观念形态。学者们重点分析了“浙江村”中的“关系”,认为村中的亲友圈、生意圈相交相叠,构成了社区的整体秩序。北京“浙江村”的研究之后,比较有名的还有北京